

“西北胡杨”胡德海先生的教育家精神诠释

万明钢

摘要：我国当代著名教育理论家、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胡德海先生扎根西北73载，深耕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理论与学科体系，被誉为“西北胡杨”。胡德海先生的生命历程、学术贡献与师者风范是对教育家精神的生动诠释。胡德海先生一生扎根西部的家国情怀、“读书、教书、著书”的纯粹学者风骨、致力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学术躬耕、严慈相济的育人方式、毕生献身师范教育的赤诚之心、以文化人的教育哲学追求，分别从不同侧面印证了教育家精神的丰富意蕴。先生的个案表明，教育家精神不是抽象的理论命题，而是可以从老一代教育学人的生命实践中辨识和弘扬的活的精神传统。

关键词：教育家精神；胡德海；大先生；师范性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024(2026)04-0134-09

2026年4月12日，我国当代著名教育理论家、教育学家，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胡德海先生因病在兰州逝世，享年98岁。噩耗传出，教育学界震动，胡先生生前好友、同事和学生，顾明远先生、郭戈研究员、刘旭东教授、刘庆昌教授、李保强教授、高闰青教授等学界同人纷纷撰文追忆，媒体迅速报道，社会各界深切悼念。一位扎根西北黄土高原七十余载的老人，何以牵动如此广泛的学术情感？这不仅因为他是我国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领域成就斐然、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更因为他以自己的生命历程，完整地诠释了一种足以感召后来者的教育家精神。笔者1982年毕业留校，在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与胡德海先生在同一单位共事四十余年。先生既是笔者景仰的前辈、老师，也是朝夕相处的同事。数十年间，笔者亲眼见证了先生的治学之勤、为人之诚、育人之切，对先生的精神品格有着切身的感受与体认。先生辞世之后，笔者在悲痛之余，更深感有责任从学理的角度审视先生的精神遗产，以期对教育家精神的阐释有所裨益。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信中，首次提出了教育家精神，并系统阐释了教育家精神的核心内涵，即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这一论述将中国传统师道精神与新时代教育使命有机融合，为理解和弘扬教育家精神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框架。教育家精神提出以来，学术界围绕其历史渊源、理论内涵与培育路径展开了广泛讨论。已有研究或从中华传统师道文化中追溯其精神根脉，或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阐发其理论基础，或从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实践中探讨其实现路径，成果颇为丰富。不过，从个案诠释的角

作者简介：万明钢，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兰州 730070）。

度,以某位教育家的完整生命史来印证和丰富教育家精神的内涵,这方面的研究尚不充分。教育家精神归根结底存在于教育家具体的生命实践之中,每一位杰出教育家的人生经历,都是教育家精神的一种鲜活表达。胡德海先生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个案,他的一生几乎覆盖了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全部历程,其精神品格与教育家精神的各个方面形成了深切呼应。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先生作为扎根祖国西部的教育家,他的生命经验能够为教育家精神增添一种独特的西部维度。在中国教育发展区域差异显著的现实背景下,西部教育家的坚守与奉献赋予了教育家精神以特殊的内涵。本文拟以教育家精神的六个方面为观照,以胡德海先生的生平事迹、学术思想与师者风范为基本材料,进行一种扎根于西部大地的教育家精神个案诠释。谨以此文悼念先生,并就教于学界同人。

一、“西北胡杨”的生成：胡德海先生的生命史与精神底色

要理解胡德海先生的教育家精神,首先须回到他的生命史。正是那些具体的生活经历,塑造了先生独特的精神人格。

(一) 从江南水乡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

胡德海先生1927年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市的一个农村家庭。先生的祖父受传统耕读文化影响,十分重视后代教育。先生少年时期,经历了抗日战争的烽火洗礼,亲历了国难当头、遍地烽烟的岁月,心中燃起了强烈的爱国情怀。1942年先生进入金华市汤溪初中读书时,偶然读到一副“万事莫如为善乐,百花争比读书香”的对联,从此形成了“天下事只有读书最乐、最好”的人生信条。这一信条伴随了他此后的全部生命。

1949年秋,胡德海先生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教育系,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北师大教育系的第一届学生。大学四年,他把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图书馆,早去晚归,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正是在北师大求学期间,他结识了同窗顾明远先生,两人由此开始了持续七十余年的学术交往与深厚友谊,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二) 投身西北与15载“失意”岁月

1953年大学毕业后,先生响应国家号召,被一纸派遣文书送往大西北,到西北师范学院(1958年更名为甘肃师范大学,1981年复名为西北师范学院,1988年更名为西北师范大学)任教。这一去,就是73年。以当时的条件而言,放弃留京机会远赴黄土高原,绝不只是简单的服从分配,这其中更包含着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对国家教育事业的深切责任。

然而命运并没有让他一帆风顺。20世纪50年代后期,受政治运动影响,先生被迫离开高校讲台,调至甘肃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语文和英语,一教就是15年。换作旁人,这段遭际足以消磨学术志气,但先生不然。据同事和学生们回忆,先生后来谈到这段岁月时从无怨言,反倒认为那是他学术积累的黄金期。在中学教学之余,他大量阅读外语、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这些跨学科知识的积累,恰恰为他后来构建宏大的教育学体系埋下了伏笔。这种在逆境中默默蓄力的品格,正是“胡杨精神”最初的底色——胡杨能在荒漠中挺立千年,只因根系早已植入大地深处,靠的正是一种沉潜于无声处、厚积而薄发的力量。

(三) 学术复归与晚年创化

改革开放后,西北师范学院教育系恢复了招生并成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胡德海先生到了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重新从事他热爱的教育学原理研究与教学工作。此后四十余年,他迎来了学术生涯的高峰期,开设了“比较教育”“教育学原理”等核心课程,长期投身甘肃省高校师资培训工作,讲授“人生与教师修养”课程达10年之久,69岁时出版《人生与教师修养》,71岁时出版《教育学原理》。先生毫

耄之年离开教学岗位，90岁后仍笔耕不辍，2023年出版《教育学是什么——胡德海教育随笔》，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在关注元宇宙、人工智能与教育变革的关系。胡德海先生还是西北师范大学民族地区教育研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1985年，西北师范学院获批成立了民族教育研究所，先生出任首任所长。任职期间，他多次带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深入甘肃省、青海省、西藏自治区等地区开展调研，撰写了多篇高质量调研报告。时至今日，先生围绕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地区教育、民族文化教育等议题的学术观点，仍是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正是在先生的引领下，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形成了民族地区教育研究的特色，也使笔者确立了数十年深耕民族地区教育研究的学术方向。

顾明远先生在悼念文章中将胡德海先生喻为“西北的胡杨”^①，精准地概括了先生的精神气质。胡杨生长于荒漠，根深叶茂，耐旱耐寒，千年不朽。先生虽生长于江南水乡，却在西北黄土高原上扎下了一生的根基，以73年的坚守证明了一种中国知识分子安贫乐道、扎根大地的人格力量。可以说，“胡杨”这一意象在先生的精神图谱中承载了三重含义：一是扎根，面对艰苦条件依旧对理想坚守不移；二是高洁，在物资匮乏环境中仍保持精神的丰盈；三是庇荫，以自身的学术成就和人格力量为后学提供成长的空间与养分。正是这棵“西北胡杨”，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用生命诠释教育家精神的宝贵案例。回顾先生的生命历程，可以清晰地辨识出一条精神发展的主线：从少年时期的爱国情怀出发，经由青年时期的专业选择、中年时期的逆境淬炼，到晚年时期的学术创化与精神升华，先生的精神人格在不断丰富和深化。这一主线恰好与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宏观历程相互映照，使先生的个体生命史获得了超越个体的时代意义。下文将以教育家精神的六个方面为线索，逐一对胡德海先生的精神图谱进行个案诠释。

二、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扎根西部73载的家国情怀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居于教育家精神的首位，指向教育者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民族命运的理想信念。这一精神在胡德海先生身上有着最为鲜明的体现。

胡德海先生的“至诚报国”不是一时的慷慨激昂，而是一生的默默坚守。先生大学毕业后没有选择留在条件优越的东部高校，而是在祖国西部扎下了根。这种选择的意义，需要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时代精神中来理解。先生以“一生的坚守”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他要在西部、为西部培养教育人才，用自己的学术劳动为西部教育事业奠基。

先生的家国情怀还体现在对“师范教育”的坚守上。20世纪末，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规模扩张期，许多师范院校纷纷追求“综合化、大学化”，师范性在这一进程中面临被稀释甚至被边缘化的危险。先生对此深感忧虑。他反复强调，师范院校的“师范性”不可以被弱化，师范教育重视教育类课程和实习实践，重视师德养成和教育情怀的培育，精髓在于“师道文化”与“自主反思”。^②在他看来，师范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根基所在，师范性一旦丢失，教育的根本也就动摇了。先生之所以对此念兹在兹，并非出于对某一所大学排名升降的计较，而是放眼整个国家教师培养体系的长远走向。2023年，已届96岁高龄的先生在与李瑾瑜教授的一次访谈中仍然在思考未来教师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素养，他的回答朴素而坚定：师德为先、知识广博、人文底蕴深厚。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还在为祖国教师教育的未来忧心谋划，这本身就是“心有大我”最真实的写照。

^① 顾明远. 胡德海：深耕教育理论扎根西北的胡杨 [N]. 中国教育报，2026-04-15（3）.

^② 李瑾瑜. 传统师范与师范传统：探寻师范教育创新的守正之义：胡德海教授访谈 [J]. 教师发展研究，2023（4）：68-75.

熟悉先生的人都知道，先生对国家教育政策的每一次调整都格外关注。郭戈研究员在悼念文章中特别提到，先生90多岁时开始关注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冲击，忧虑的不是自己的学术是否会被时代抛下，而是教育会不会让人沦为技术的附庸。可以说，“大我”是先生生命的底色，“报国”是先生学术的指南。73年扎根西北的坚守，就是对理想信念最有力的诠释，这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一个人用一辈子去践行的东西。

三、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读书、教书、著书”的学者风骨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强调的是教育者以自身的人格力量示范和引领社会风尚。胡德海先生以“读书、教书、著书”三者互为因果的生命轨迹，树立了一种纯粹学者的人格范型。

先生将自己生命轨迹概括为“三书”。先生认为，读书是为了教书，是为了教好书，教书其实也是为了读书，读书、教书的结果是写书、写文章。所以，“读书、教书、著书”密不可分。此三者不仅先后相连，逐次出现，而且彼此联系、互为因果，是他生命运行的基本轨迹。^①这段自述不是文学修辞，而是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从青年时期在北师大图书馆泡到闭馆，到晚年时期视力衰退仍坚持阅读；从大学毕业走上讲台到耄耋之年离开教学岗位；从69岁出版第一部著作到90岁后仍有新作问世，“三书”贯穿了先生的全部生命。先生的道德情操还集中体现在其甘于清贫、淡泊名利的生活方式上。郭戈研究员在悼念文章中回忆了先生书房的场景：书架上塞满了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书籍，但家中别无长物，陈设极其简单。先生不追求官职，不热衷社交，唯独对书籍和育人情有独钟。20世纪80年代，从图书馆借书是获取阅读资源的主要途径。那个年代，在大学图书馆借阅图书需要填写借阅卡片，卡片通常插在图书封底内侧的纸袋中，上面会记录每一位借阅者的信息。笔者至今仍清晰记得，当时从学校图书馆借出的每一本教育学、心理学和哲学类书籍，借阅卡片上几乎都留有先生的借阅记录。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先生在学术评审中的刚正风骨。先生曾担任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的审查委员，在审查教材时坚持学术标准，曾否决了一套未达标准的语文教材。这种不因人情世故而放弃学术底线的坚守，正是“言为士则”的最好注脚，他以自己的行为践行了学者应承担的公共责任。

先生常以“天下事只有读书最乐、最好”自勉。2016年，在西北师范大学举办的胡德海学术思想研讨会上，89岁高龄的先生一场报告也没有落下，静静坐在前排认真听讲，不停地做着笔记。一位年轻的博士生坐在先生后排，看着他聚精会神的背影，由衷赞叹。这个细节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行为世范”——它不是居高临下的道德说教，而是以身作则的精神感召。

在当今学术界，急功近利、追逐项目与头衔的风气并不罕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先生的生活哲学。先生不追求功名，不计较论文数量与发表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在笔者的印象中，先生从不申报各类基金项目，也从不主动申报各种奖项，他所获得国家图书奖、全国教材建设奖都是出版社申报的，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真正的学术思考与人才培养之中。先生的重要学术成果几乎都完成于他退休之后。这种“大器晚成”并非迟钝，而恰恰是“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治学精神体现。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实践告诉后学：学术研究不是短期竞赛，而是一辈子的事业；学者的尊严不在于外部的标签，而在于内心对真理的忠诚。这正是“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在当代学术语境中最需要被重新唤醒的价值维度。

^① 胡德海. 读书、教书、著书：我的教育生涯和人生感悟 [J]. 中国教育科学, 2018 (2): 62-78.

四、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严”与“爱”相融的教学方法

“启智润心、因材施教”指的是教育者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所展现的专业智慧。在胡德海先生身上，这种智慧不是技术化的教学方法，而是浸润于生命之中的育人之道。

先生指导学生论文的方式堪称经典。据学生张永祥教授回忆，先生往往通过电话将学生叫去，面对面逐字逐句地修改文章。即便在观点上不认同，先生也会坦诚指出，而不是模棱两可地敷衍了事。这种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态度，成为胡门学派的治学传统。学生李保强教授回忆了2003年求学期间的一个场景：先生对其论文中“本质与概念”问题的精准点拨，让他茅塞顿开。这种点拨不是灌输式的给出答案，而是启发式地引导学生找到思考的方向，这正是启智润心的精义所在。

还有一件事同样让人感佩。学生高闰青教授回忆说，先生常常在学生送来的论文初稿上逐字逐句地修改，改完直接寄回，却从来不在上面署上自己的名字。这个做法背后用心很深，学生拿到修改稿，一一对照，哪里不好、为什么改，比任何说教都来得直接；而不署名，又保全了学生作为独立研究者的体面。先生常说“做学问先要学做人”，在他看来，学术研究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学理分析和独立思考之上。

先生因材施教的功夫，在他数十年的研究生培养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和先生接触过的学生都有一个共同感受：先生对每个人的研究兴趣和性格脾气都摸得很清楚，从来不会要求所有学生都走同一条路。当然，放手归放手，学术标准先生从不含糊，该严格的地方绝不通融。张永祥教授就曾谈到，先生如果觉得学生的某个判断有问题，一定会直说，但绝不会越俎代庖替学生改掉。他要的是学生在反复辨析中找到自己的路，而不是跟在老师后面亦步亦趋。刘庆昌教授在追悼会上忆及2005年毕业时，先生赠他一幅字，落款为“庆昌学弟雅正”，有人不解“学弟”之谓，先生答曰：“在我们中国传统中，学生待老师应如兄如父，反过来，老师待学生当如弟如子。”一则轶事，道出了先生因材施教背后那份平等而深挚的师生伦理。

先生提出的教师修养“十诀”——“自爱、自尊、自立、自达、自强”与“爱人、尊人、立人、达人、强人”，更是将“因材施教”的智慧上升到了师德伦理的高度。这一论述一面强调教师的自我修养，一面强调教师对学生的关爱与成就，构成了一个内外兼修、知行合一的师德体系。“自爱”而后“爱人”，“自尊”而后“尊人”，“自立”而后“立人”，“自达”而后“达人”，“自强”而后“强人”。先生用这种层层递进的对应关系表达了一个深刻的教育伦理命题：教师只有先完成自我的修养与成长，才能引领学生走向同样的修养与成长。这不仅是先生理论思考的结晶，更是先生数十年教育实践的经验总结。教师修养“十诀”将传统儒学的修身理想与现代教师专业发展的要求融为一体，可以说是一种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育人智慧，对当前教师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五、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学科体系

“勤学笃行、求是创新”要求教育者在学术研究中要保持严谨态度与创新精神。这一点在胡德海先生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也是先生学术贡献的核心所在。

（一）对苏联模式与西方教育学的反思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教育学理论主要照搬凯洛夫（Каиров）的课程体系。1953年，刚走上讲台的先生便敏锐地感到了问题所在，指出将苏联理论与中国教育实际简单拼凑在一起的做法，“看似有理有据，实则貌合神离，是粘不到一起的‘两张皮’”。他由此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学术设想，即构建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教育学学科体系，以取代旧式教育学理论模式。这一设想在当

时无疑是超前的，因为要实现它，不仅需要深厚的理论功底，还需要与主流话语对话的学术勇气。

（二）四十年磨一剑：《教育学原理》的诞生

《教育学原理》这部书的写作历程本身就是一段传奇。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初登讲台时就开始酝酿，此后数十年间边教学、边读书、边思考，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正式动笔，前后打磨十余年，1998年终于出版。《教育学原理》出版后获得了广泛认可，先后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第一届全国教育图书奖一等奖、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二等奖等国家级大奖，被教育部审定为全国研究生教学指定用书。《教育学原理》之所以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根本原因在于它不是对既有教育学教材的修修补补，而是从根基上重新思考了几个关键问题。

关于教育的本质，学界此前长期纠缠于“上层建筑说”与“生产力说”的争论，先生跳出了这一窠臼，明确提出教育的本质是“生命发展”，把研究的目光从教育的外部社会功能拉回到生命成长本身。关于教育的起源，他对流行的“劳动起源说”“生物起源说”都做了批判性审视，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解释。在教育形态方面，先生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及正规与非正规教育加以系统梳理，建立起了一套层次清晰的分类体系。而贯穿全书的，是先生一以贯之的教育哲学立场，即教育学应当具有文化的眼光，应当研究人性与人心。先生提出的“人是肉体与文化的复合体”“教育学是教育的影子”等命题，至今仍被广泛引用。这些论述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们各自具有理论上的突破意义，更因为它们合在一起，实质性地改变了中国教育学的研究取向，即从偏重功能分析走向关注生命意义，从偏重制度描述走向关注人的成长与文化遗产。在方法论上，先生同样作了大胆的尝试。他不愿在既有的学科格局里打转，而是从哲学的高度重新为教育学定位，认为教育学应当是一门介于哲学、文化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人学”。这个判断在当时相当超前。几十年过去，国际教育学界越来越强调教育研究的跨学科性和人文关怀，回过头看，先生当年的定位确有远见。刘旭东教授在悼念文章中称先生为“中国教育基本理论界的学术泰斗”，认为先生毕生开拓求索，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教育学话语体系。

（三）晚年面向人工智能与元宇宙开展人学追问

先生的学术探索并没有因为年事已高而停下来。90多岁的先生把目光投向了人工智能和元宇宙，思考的问题也从传统的教育学理论延伸到了一个更加紧迫的追问：在技术飞速迭代的时代，教育怎样才能守住对“人”的关怀，而不是把人训练成技术的附属品。郭戈研究员在悼念文章中感慨，先生在生命最后阶段仍然保持着对新事物的敏感和对根本问题的执着，这让他的学术形象显得格外鲜活。

从1953年初上讲台时对苏联教育学模式的审思，到1998年《教育学原理》问世，再到2023年教育随笔中对人工智能的反思，先生的学术轨迹跨越了七十余年。这条轨迹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道理：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既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也不能把别人的东西原样搬来，而是要在吃透中国教育实际的前提下，对古今中外的思想资源做批判性的吸纳，最终形成有自己面貌的理论。先生从教育本质论一路走到教育文化哲学观，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先生对教育学学术共同体建设也有着突出贡献。他长期担任《教育研究》杂志的编委和顾问，审稿一丝不苟；与此同时，他对新创办的刊物同样热心，《中国教育科学》创刊时，先生不但赐稿，还亲自题写了寄语。在先生看来，学术不分高低贵贱，年轻人办刊不容易，能帮一把就帮一把。这种胸襟说明，先生心里装的从来不只是自己的学问，而是整个学科的生态和未来。先生用自己的学术生涯证明，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口号，而是一代又一代学人接力躬耕的漫长过程。先生在这一过程中走完了他的一程，留下了坚实的路标。

六、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以生命托举后学的师者情怀

“乐教爱生、甘于奉献”讲的是教育者对教育事业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对学生的深厚感情。在胡德海先生身上，这种仁爱之心表现为一种近乎本能的“以生命托举后学”的师者情怀。

先生对教学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他常说：“当教师，可以终身与书结缘，一辈子和书打交道，这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佳途径，也应是最好的选择。”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使他在86岁时仍坚守讲台，在90岁时仍指导博士研究生。2015年，李保强教授邀请了当时已88岁高龄的先生前往武汉大学做学术报告并指导博士答辩，先生欣然应允，长途跋涉也在所不辞。这种精神不是工作狂式的执念，而是真正热爱教育、乐在其中的生命状态。

先生对学生的爱更体现在具体的关怀行动中。高闰青教授深情回忆了毕业时的一幕，先生不仅没有接受任何学生的馈赠，反而将自己珍藏的几大箱书籍赠予学生，并语重心长地嘱咐“不要放弃专业，要爱读书”。这种赠书传道的行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远的象征意义。书籍是知识和精神的载体，赠书就是传道，就是将自己一生的学问和信念托付给后来者。综合多位学生的追忆可以看到，先生的仁爱不仅是情感上的温厚，更是一种自觉践行的师道。他以为后学铺路为己任，以赠书、改稿、指点为日常，默默支持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学者的成长。

更令人感动的是先生在生命最后阶段的表现。李保强教授曾陪伴生病的先生住院，目睹了先生在病榻上仍坚持思考学术问题的场景。在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先生在病重住院期间仍与顾明远先生保持着学术通信，与学界同人保持学术交流，直至4月12日溘然长逝。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先生仍然心系学术，其精神令人肃然起敬。这种矢志不渝的学术热情，不是对名利的追逐，而是对教育事业和学术真理的纯粹热爱。

先生的仁爱之心还表现在他对学科整体发展的无私支持上。先生把自己积累的学术资源，无论是学术人脉、研究资料还是教学经验，都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后辈同人。在先生看来，个人的成就固然重要，但学科的发展和后学的进步才是更大的事业。这种超越个人利益的“立人、达人”精神，正是教育家精神“甘于奉献”的真切体现。

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探索中国教育学文化根源的责任担当

“胸怀天下、以文化人”关乎教育者在文化传承和文明发展中所承担的弘道使命。这是教育家精神中最具思想高度的一个方面，也是胡德海先生学术思想中最具原创性的内容。

要理解先生的教育思想，有一个核心概念绕不过去，那就是“人”。先生反复讲，“人是肉体与文化的复合体”，教育说到底就是文化的传递，即上一代人把知识、价值和精神经验交给下一代，个体才能从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逐渐长成文化意义上的社会人。他还常将“教育学是教育的影子”这句话挂在嘴边，意思是教育学应当紧贴教育实践，用文化的眼光去观照社会和历史，用人文的精神去理解教育中的人。按照先生的理解，教育学绝不是一套操作技术，归根结底它是一门关于人如何成为人的学问。

先生晚年的学术兴趣有一个明显的拓展的过程。他不再局限于狭义的教育学理论，而是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向中国传统文化。2023年出版的《教育学是什么——胡德海教育随笔》就集中讨论了儒家修养传统、中国文化的基本特性等问题。^① 他和高闰青教授合作发表的关于传统文化的长篇访

^① 胡德海. 教育学是什么：胡德海教育随笔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3.

谈,更是系统梳理了传统文化对当代教育的滋养。^①可以看出,先生到了晚年,心里想的已经不只是教育学这门学科怎么建设,而是在更大的文化视野中重新审视教育的意义。

先生提出的“自爱、自尊、自立、自达、自强”和“爱人、尊人、立人、达人、强人”教师修养“十诀”,是他把“以文化人”理念具体落到教师修养上的代表。他的意思很明确:一个教师要想去影响学生、化育社会,自己首先得是一个有修养、有文化根底的人。先生常说,做“经师”更要做“人师”。这句话朴素,但分量很重,它点出了师范教育最该坚守的东西。先生的学术视野从来不局限于书斋。他早年研究过雷沛鸿的教育思想,晚年又去关注人工智能和元宇宙对教育的影响。表面上看,这些议题跨度很大,但贯穿其中的始终是同一个追问:世界在变,技术在变,教育怎样才能不丢掉对“人”的关怀。正是这个追问,让先生的思考具有了一种超越具体时代的穿透力。

说到这里,“胡杨”这个意象也就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胡杨扎根荒漠、挺立千年,令人敬佩;但胡杨更可贵之处在于,它能在寸草不生的地方创造出一片绿洲。先生在祖国西北大地上做的事情,何尝不是如此,他用一辈子的教育与学术,在这片土地上培育出了一方精神的绿洲,庇荫了一代又一代后来者。从更深层的理论视角来看,先生的弘道追求实际上回应了当代教育面临的一个根本性挑战:在功利主义思潮蔓延、技术变革日新月异的时代,教育如何坚守“化人成人”的根本使命。先生的回答是明确的,教育必须始终以“人”为核心,坚持以文化人。教育不是训练有用的工具,而是培养完整的人;教育学不是技术操作手册,而是关于人之生成的学问。这一立场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今天,具有更加深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先生以他一生的学术探索,为“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书写了最深沉的注脚。

八、从“一个人”到“一种精神”——弘扬教育家精神的个案启示

通过以上六个方面的诠释,我们可以看到,教育家精神在胡德海先生身上并非零散地存在,而是交织为一张不可分割的精神图谱。扎根西北的家国情怀支撑了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学术躬耕,“三书”人生的纯粹理想涵养了他关爱后学的师者仁心,严谨而开放的育人方式又与他以文化人的学术追求相互贯通。在先生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分门别类的品德清单,而是一种浑然一体的人格力量。这种力量的根源,在于先生将教育视为自己的生命事业,将学术探索视为自己一辈子的志业。教育和学术对于先生而言不是一种职业,而是生命本身,因此各方面的精神品质才能如此自然地融为一体。笔者认为,胡德海先生的教育家精神给予了我们三点启示。

一是教育家精神需要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迹来落地生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教育家精神具有高度的理论概括力,但要使其真正成为激励广大教师的精神力量,就必须通过鲜活的人物、真实的事迹来赋予它血肉和温度。胡德海先生作为“西部教育家”的典型代表,他的生命史为教育家精神提供了一个扎根西部大地的生动诠释。这种诠释告诉我们,教育家精神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人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所展现出的精神品质。在中国广袤的西部大地上,还有许多像先生这样默默耕耘的教育工作者,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教育家精神的丰富内涵。二是教育家精神需要以教育理论的文化自觉和自信作为支撑。先生一生最核心的学术追求,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在当今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大背景下,先生的这一追求具有更加重要的时代意义。教育家精神不仅仅是师德问题,更是学术问题,一个没有自主知识体系支撑的学科,很难培养出具有文化自信的教育家。先生以七十余年的躬耕告

^① 高闰青,胡德海.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基本特性及其价值意义:专访胡德海先生[J]. 当代教育与文化, 2020(2): 15-21.

诉我们，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是教育家精神不可或缺的知识根基。三是教育家精神的传承离不开师范性的坚守。先生一生始终关切师范教育的命运。他反复强调师范院校的“师范性”不可弱化，教师不仅要做“经师”更要做“人师”。在当前教师教育改革的语境下，先生的这一主张具有重要的警醒意义。教育家精神的培育，最终要落实到教师教育的课程体系、文化氛围和价值导向之中。如果师范院校失去了“师范性”，教育家精神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孵化基地。先生以自己一生的生命实践告诉我们，师范性不仅是几门教育学、心理学课程的设置问题，更是一种文化传统和精神气质的问题。师范院校应当成为教育家精神的培育沃土，让每一位未来的教师在求学期间就能感受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精神感召。上述三点启示归结到一点，就是教育家精神需要用活化的传统和鲜活的生命来传承。教育家精神不能仅仅停留在文件中、墙壁上，而应当在具体的教育者身上得到体现、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得到传承。胡德海先生用一生证明了，教育家精神最动人的表达方式，不是宣传口号，而是一个人一生的坚守与付出。在这个意义上，为先生这样的教育家立传，总结其精神遗产，推动其精神传承，本身就是弘扬教育家精神的重要途径。

胡德海先生虽然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留下的学术遗产和精神财富将永存。正如顾明远先生所言，他就像沙漠中的胡杨，根深叶茂，傲视风沙。先生的生命也让我们重新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大先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胡德海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大先生”，他以学术的深度示范了为学之道，以人格的高度示范了为人之道，以一生扎根西部的坚守示范了为事之道。

在胡德海先生百年诞辰即将到来之际，作为先生的学生、与先生共事四十余年的同事，笔者深感，最好的悼念方式不是挽歌，而是传承。传承先生扎根西部、心有大我的家国情怀，传承先生追求真理、求是创新的学术品格，传承先生关爱后学、甘于奉献的师者仁心，传承先生以文化人、弘道不已的精神追求。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上，让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将教育家精神转化为日常实践，让“西北胡杨”的精神在新时代继续生长、枝繁叶茂。这是对先生最好的告慰，也是对教育家精神最有力的弘扬。

（责任编辑 李欣桐）

Interpretation of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of Hu Dehai

Wan Minggang

Abstract: Hu Dehai, a renowned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theorist in China and professor at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has worked in Northwest China for 73 years, devoting himself to pedagogical theory and disciplinar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is life course, academic contribution and teacherly demeanor are vivi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Hu's lifelong patriotism rooted in the western region, his pure scholarly character of reading, teaching and writing, his academic dedication of constructing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pedag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is approach of combining strictness with kindness, his sincere devotion to normal education and his educational philosophical pursuit of education through culture all verify the rich implications of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from different aspects. His case shows that spirit is not an abstract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but living spiritual tradition that can be identified and carried forward from the life practice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educational scholars.

Key words: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Hu Dehai; the great master; nature of normal education